



[法] 古伯察 著
张子清 等译

A Journey through the Chinese Empire

中华帝国纪行

下

在大清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历险

1565_64

南京出版社

[法] E. R. 古伯察 著

张子清 王雪飞 冯 冬 译

中华帝国纪行



——在大清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历险

A Journey through the Chinese Empire

I565.64
22/2

Ma-tang

目 录

第一章 1

病危—官员的药方—中医的来访—诊脉理论—中国的药师—药业—病情加剧—针灸—稀奇珍宝红药丸—试药—中国霍乱的来历—免费行医—红药丸的良好疗效—病愈—追究责任的可怕法律—悲剧故事—潜江县官的探视—中国人对棺材的喜爱—带着棺材旅行的病人—中国人临终之时的宁静—参观我们的棺材—告别潜江县

第二章 21

天门官员来访—他们的关注—天门西瓜的美名—西瓜子的广泛用途—一位年轻军官的尖酸谈吐—四川人在湖北受欺—欧洲人对中国人的偏见,论述中国举止的多部作品—东方人好静不好动之说—中国帝国的革命运动—17 世纪的社会主义学派—对他们的制度的叙述—长期激烈的较量—鞑靼煽动者的运输—蛮族入侵的原因

第三章 39

到达汉川—向遭贬官员献靴的风俗—招贴—中国人所享有的特权与自由—禁赌协会—老牛会—出版自由—公众的演讲—欧洲人对亚洲人政府专制的偏见—判官的粗心—难忘被残杀的董神父—湖上航行—水上浮岛—中国人口—起因与危害—鸬鹚捕鱼—中国人日常生活细节—在汉阳受到的冷

遇—我们走错路线—渡长江—到达武昌府

第四章 59

落脚于简陋小庙—湖北省城武昌府—中华帝国的界限—群山—江河—湖泊—气候—主要物产—中国工业—中国工业衰落的原因—过去的工艺品展览—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对欧洲通商的现状—中国内贸—中国理财人赚取百分之三十利润的制度—金钱社会—华中地区的巨大商埠—运河系统—中国人的经商能力—货币制度—小额钱币的影响—小额买卖

第五章 79

想见巡抚—闯进衙门—湖北巡抚—与这位高官的交谈—拜访见效—搬迁住所—厨师的谦恭—作别丁老爷和四川的护卫人员—新护卫队长柳某(绰号“垂柳”)—中国的建筑—寺塔—美术—宗教—儒生的信条—给孔子加封的种种最高荣誉—道士—哲学家老子的生活与见解—佛教—佛祖的传说—教条与道德格言—被文人雅士困扰的佛教徒—这些困扰的原因—分散于亚洲各国的佛徒

第六章 101

中国对各种宗教的贬斥—怀疑主义的套式—中国僧侣的处境—佛寺—宗教建筑—普陀寺—寺院的经藏楼—拜访住持—中国人对文字的崇敬—尼姑庵—叫魂—秀才之死—中国人的哀悼—中国人的哭丧—葬礼—祖先崇拜—中国人的革命分界—中国的婚姻—女子的从属地位—家庭不和—举例—忍辱负重的妇女之组织

第七章 122

离开湖北省会—向巡抚告别—两位殉教者的埋葬—湖北的基督教现状—途中不愉快的事故—三等小镇不提供伙食—访问县衙—对犯人的苛待—可怕的审判详情—混混或中国的盗贼—司法模式—法典—中国的立法概况—法典的惩罚性与功利性—某些法律条文欠精确—连保制的原则—针对官吏的法律条文—家庭的组成—镇压犯罪—礼律—税收与土地财产

第八章 143

离开广济县—暴风雨—官家信差—书信模式—黄梅县的盛大节日—焰火—中国音乐—应该对中国古代音乐具备的概念—通往北京的官道—中国的路况—滞留鄱阳湖畔—船上遭遇蟑螂—湖北省概览—中国的农业—皇家祭祀农神—细述家业—农业生产—竹子—莲藕—御稻—中国人的观察力—玉米的分类—燕子怎样过冬—让猫咪报时的方式—毛驴噤声之法

第九章 165

航行于鄱阳湖上—大量的平底帆船—荒芜地带—中国的穷人—丐帮—免费棺材社—丐帮帮主—鸡毛栈房—贫穷的原因—赌博—中国各种各样的赌博形式—对反赌博法的领会之模式—酗酒—葡萄酒与粮酒—婴儿虐杀及其原因—关于中国杀婴的真相及夸大说法—育婴堂—禁止杀婴的法令—圣婴社的工作

第十章 184

江西省未开垦的土地—兵站歇脚—醋脑子—官员及其坐骑—偷窃西瓜—到达南昌府—入住文昌宫—露天晚餐—观众的失望—知府来访—做官的蒙古人—他的地理知识—在中国的新教卫理公会信徒的劳苦—中国天文学家—江西省会概貌—瓷器制造—中国的古董—窑神的来历—江西的养鱼法—新的旅行安排

第十一章 201

告别南昌府—官船—水上旅行的舒适与奢华—车辆与客店—北京的出租马车和双轮轻便马车—中国的消闲文学—格言集锦—梅岭的通道—南雄—中国人走钢丝表演—女人的小脚—裹脚风俗的起源—航行在“底格里斯河”上—回忆1840 进入中国内地之旅—广州港口—瞥—欧洲的船舶—初宿广州—关于我们殉难的报道—途中积蓄赠予仆人魏昌—逗留澳门—秦神父之死—启程赴京—1852 年抵达马赛

译后记 220

第一章

病危—官员的药方—中医的来访—诊脉理论—中国的药师—药业—病情加剧—针灸—稀奇珍宝红药丸—试药—中国霍乱的来历—免费行医—红药丸的良好疗效—病愈—追究责任的可怕法律—悲剧故事—潜江县官的探视—中国人对棺材的喜爱—带着棺材旅行的病人—中国人临终之时的宁静—参观我们的棺材—告别潜江县

人在经历了以下这段曲折之后就会认同一个观点：没病就是福。人这一生的幸福感受其实是不可捉摸的，甚至是不堪一击的，哪怕是遇上小小的疾病都会彻底地失去幸福。然而对于远走他乡的旅人来说，健康不仅仅是一种好运，更是一种不可估量的珍宝，因为当你远离亲友，病倒于异国他乡，而周围的人却把你当作累赘厌物，对你漠不关心的时候，事情就悲惨得很了。当一个人只能指望得到别人相助，而不知如何求得上帝的支持与安慰时，情况该有多么危急，多么可怖！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长途旅行，虽然历尽曲折艰辛，但却尚未经受这种痛苦的考验。在鞑靼和西藏旅行时，我们差点饿死冻死，差点被野兽吃掉，被盗匪杀掉，差点葬身于雪崩。稍一失足，就会从山顶跌下万丈深渊。

出了西藏，有衙役们扬起手中的刑具恫吓我们；有造反的民众团团围住我们；最后又遇上一场暴风雨，洪水几乎吞没我们。死神以各种形式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与我们近在咫尺的地方。要想脱身可不容易，这次又看见死神静悄悄地站在我们跟前，随时都会以最最常见的方式把我们捉去，就在这两天两夜的时间里，老天爷让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令人伤心的场面。

我们到达潜江县的那天夜晚,当地主要官员前来探望。就在宾主相见之时,我们突然呕吐不止,胃痛难忍,从头到脚,整个身体仿佛快要散架一样,只好赶紧卧床休息,同时,派人去喊医生。据说那是全国最出名的医生,此人可以毫不费力地治愈各类疑难杂症,不断创造妙手回春的奇迹。但我们对他的医术一点不抱信心。就在大家等待医生的时候,我们的随行官员和潜江县的官员凭借各自的渊博学识,就我们发病的原因和应该采取的疗法展开了颇有把握的讨论。

我们先前说过,从气质上讲,中国人特别适宜担当演员和厨师。我们还可补充一点,他们或多或少地懂些医家门道。在场的人都以极其在行的术语对我们的病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经过这次纯属偶然的会诊,这帮好心人所得出的结论是:“贵恙皆因气阻滞,升降失调所致。”他们认为,里热炽盛,火毒充斥,“诸逆冲上,皆属于火”。火性燔灼,致使吾等全身呈现热象。火旺则水枯,腑脏功能紊乱,故而出现呕吐腹痛。一般说来,功能紊乱可从我们的脸上看出,这的确不假,我们当时早已疼得五官扭曲了。

为了重新建立所谓的机体平衡,必须向体内输送一定量的凉性药物,旨在败火去热。因此,必须促使体内水分返回肢体各处。这样就可立即康复,我们也能重新赶路了。有一种简单办法,可使机体恢复和谐。人人皆知,绿豆特具寒性,所以他们弄来一定量的绿豆,准备煨汤给我们喝,用以降火。

潜江一位县官却建议我们服用该汤药时务必注意剂量适中,免得引起发寒。但是,丁老爷却打断他说,我们就是喝下双倍剂量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照他看来,我们的身体天生要比中国人燥热得多。为给机体补充必要的水分,从而壮水制火,恢复平衡,当时他还决定给我们煮些黄瓜和西瓜。

大家一致同意,为了让我们尽快康复上路,最需要的降温药莫过于绿豆、黄瓜和西瓜。就在这时,延请的医师到了。他非常讲究礼节,同时也很落落大方,一看就知道已经过了频繁出诊的年龄。他个子不

大，一脸亲切，那圆溜溜、胖乎乎的体型，仿佛是在刻意传扬着自己的养生之道。而他那扁塌塌的小鼻子上戴着一副大大的眼镜，系着镜架的丝线则扣在耳朵后面，看上去医术造诣颇深的样子。不仅胡子有些灰白，而且那根拖在脑后的发辫也有些花白，这也进一步说明其行医经历不浅。他走近我们的病榻，嘴里念念有词，这在我们听来未必全无意义。

他说：“本人获悉，尊贵的患者生于西洋国度。书上记载，疾病各国不同。北国之疾异于南国，每个民族有其独特疾病，每个国家出产独特药物，从而适应当地居民普遍患有的疾病。作为良医，理应区分迥异，以求把握病症，开具合适处方，此乃医术之本。我们为西洋人治病，不可套用医治中国人之法。”这位医生在阐述这些原则时，声音婉转动听，手势丰富传神。接着他就拉过一把竹椅，在我们床边坐下，叫我们把右臂伸出来，搁在他拿出的一只小垫子上，而他则伸出手指为我们把脉，样子像是在弹钢琴。中国人认为，心肝五脏，各有本脉。若要辨准脉象，则需依次久按，辨明脉证。在长时间的诊脉过程中，医生始终低着头一言不发，目光盯住自己脚尖，仿佛陷入了沉思。右手切脉完毕，轮到了左手，整个程序依然如故。最后，医生才一本正经地抬起头来，同时连捋两三下胡须，并且摇了摇头，这才开口说道：

“无论如何，阴邪内扰，寒气已经袭入体内，故而多处脏器出现寒热相抗，难免引起呕吐与痉挛，因此务必施用热药祛除寒邪。”

那些就在几分钟之前还持有相反看法的官员无不立即点头称是，完全赞同起医生的诊断来。

丁老爷说：“情况就是这样嘛，冷热相竞，两者不和，是再明显不过的了，眼下需要的是怎样加以调和，我们刚才就在探讨这些了。”医生接着说：“贵恙无需多虑，可望药到病除。不过，或许有所抗拒，甚至于益发危急。以上拙见，乃本人综观脉象之断语也。”

这种观点四平八稳，对于听者，它不显得糟糕透顶；对于言者，也不至于累及自身。医生继续说道：“我即将开药，诸位务必静心休息，

每隔一个钟点就要服药一剂。”他边说边立起身来，走到一张摆有文房四宝的小桌边坐下。接着，这位博学先生把一小块黑墨拿起来往一只茶杯里蘸了一下，就在砚台内磨了磨，再拿起一支笔，在一张大纸上写起了一行行中文处方。他把那一张大纸写得密密麻麻的，接着拿起来细细默读了一遍，然后走近我们床边，一一地讲说其内容。他把处方递到我们眼前，伸出右手食指，对着那些文字指指点点，进行着详细的解释——他那长得惊人的指甲就在我们眼前移来晃去。他把药的配方和作用说得头头是道，我们却因头痛欲裂，听不明白，无法跟上思路。不仅如此，我们所剩无几的一点注意力也被那只穿行于字里行间的超长指甲分散掉了。然而，我们好歹明白了一点，该药方主要成分包括大黄和陈皮，此外还有各种粉末，还有植物的叶子和根。每一味药专门作用于某个特殊器官，以产生预期疗效，它们合成整体，则可迅速恢复我们的健康。

根据习惯，这些中药要一起倒入陶罐长时间煎煮，直到沸水被药材充分吸收，这才让患者趁热喝下汤汁。煎好的中药几乎全都具有油性，黑里透黄，一看就顿生恶感，医生不管开具什么药方，都会放入一种黑乎乎油光光甜津津的东西。说实在的，假如不去计较这些药汤的外观，则会发现并不是太难下咽，它们大多带有淡淡甜味，绝不像我们欧洲药师所开的某些药物那么恶心，那么撕肝裂肺，让人翻江倒海地难受。

这位中国内科医生为我们的“贵恙”诊治完毕，就向在场的人一一鞠躬辞行，临别答应次日上午还会再来。潜江县的官员也起身告退。当时大家都忧心忡忡，因为医生说了，我们必须留下来好好休息；从我们的病情来看，即使不至于会就此长眠于当地某座山脚之下，却至少可能会在此地逗留较长的时日。他们这么左思右想，自然会感到格外地焦虑不安。

等那些人全都走光以后，丁老爷问我们是否有必要按照医生的意思去配药。实话实说，医生和医药，我们全都不抱任何信心，但除此以

外哪有更好的办法呢？人都病成这副可怜模样，还能求助于谁呀？只好寄望于主宰生死的上帝，他总会将神奇的功能赋予生长在大地上的植物，从而减轻人类的病痛的。这些草药虽然其貌不扬，上帝却可让它们具有某种特殊效力，但愿我们得蒙天恩，恢复健康。

《圣经》上教导我们，一旦迫不得已，就应尊重医生。眼前的情形恰好如此。所以，让我们尊重中国医生，按其医嘱办事吧。于是，我们这样回答丁老爷：“当然是呀，必须照他的处方配药。”

公馆的一名听差被派到刚才开处方的医生家里去配药。在中国，医生同时也是药剂师，向病人出售自己所开的药品。虽然行医与售药互不排斥，属于密切相关的两个行业，但由同一个人来兼营还是有所不妥。这样难免自说自话，昧心牟利。譬如，出于人性的弱点，医生很可能故意开列高价药品，甚至有时还会延长病期，以使药店趁机赚取可观利润。中药的成分剂量过杂过多，每次都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我们刚才提到，行医的和卖药的同属一人，而又不敢枉下结论说这种做法绝对没有趁机牟利之嫌。

由于担心受到医生的敲诈，中国人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习惯。医患之间往往会在药的售价与作用上费一番口舌。患者家属也会参与这种奇怪的讨价还价，他们要求医生开些价格便宜的普通药物，还会拿药单一一过目，看到太贵的就划掉不用。这样做可能会影响药效，但他们宁愿如此冒点儿险。他们还总希望这种小小改动不至于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兴许到头来结局还是没有两样呢。说起中医中药来，不管哪个处方，其实彼此之间并无多大差别，无论喝下了多少黑乎乎的药汤，结果可能没有多少的不同。

经过长时间的争辩，医生一般是会同意削减一些药品。原因很简单，他若是不肯把价钱降下来，患者可能就会另找一家药店了。不过，有时还会出现中国特有的令人费解的局面。说到最后，医生兼药师的人往往会以无可争辩的口吻作出声明：要想病好，非得使用某某药方才是。此时，全家人就可能聚在一起开会，甚至还会当着病人的面，口

无遮拦地议论起生死大事,时常提出种种不肯用药的理由,诸如考虑到病人年事已高,或是患了不治之症,不如省下这笔无济于事的开支,顺其自然算了。经过仔细的盘算,发现这些并不管用的药物还得花费不少银两,就在这时,卧病在床的病人往往就会主动发表意见说,倒不如省下这笔钱买口好棺材,因为人或早或迟总要死的,为了办个像样的丧事,就是少活几天也值得。经过这么一番自我宽慰与展望,他们就把医生打发走了,接着便开始找人商量治丧事宜了。一个中国人死到临头,所考虑和关注的竟是这些。

所幸我们不必如此精打细算,因为这次看病抓药将由官府负责花钱,如果必要,他们还会提供棺材。他们事先还曾安慰我们,保证会恭恭敬敬地让我们入殓于上等寿器。这样,我们的心头就了却了一桩大事,于是除了静心吞下送来的中药之外,什么都不用操心,连药价也懒得打听了。潜江县的医生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如此省心的患者。

但是,并没有因为我们态度端正就能药到病除,至于药好药赖,抑或不好不赖,我们都难以评说,我们只晓得第二天情况相当危险。当时,药量增大了,病情也变重了,发着高烧,头疼得天旋地转,皮肤又烫又干,肠道里面还一阵阵剧痛。当时的症状大致如此。医生一刻不离地守在我们床边,对这位自命不凡的老先生来说,事关重大,弄不好是有损于脸面。眼下他正独自一人同洋鬼子打着交道,若是能够克服这种来势凶猛,从未出现在天朝帝国臣民身上的奇异顽症,那么毫无疑问,这位医师就是创下奇功,赢得殊荣了。接下来的那一天,我们在该县所下榻的公馆房间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太明白,脑子一片混乱,时而出现法国,时而又是中国,这一切全都搅在一块,奇形怪状,荒诞不经,而那些互不相干的人影也随着我们的胡思乱想一下子浮现在眼前,此外还传来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谈话声。到了晚上,我们总算变得神志清楚一些,这才明白,医生是在谈论扎针的事。我们一听就攥起了拳头,怒目而视,吓得他连连往后退缩。我们得承认,这样表达意思不太合乎礼仪,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看看我们病成这副

模样,也许就会觉得这种丧失理智的行动情有可原。

针刺疗法发明于中国远古时代,后来传到日本,这两个国家经常采用针刺疗法来医治很多疾病。它是用一根长长的金属针刺入人体,至于扎在何处,插入多深,朝哪个方向下针,全由扎针者决定。有时还会把针烧红,传说此法可以收到奇异疗效,但是只有从小生在日本或者中国的人才会真正让自己的身体成为任人插针的针垫。

针刺疗法曾经相继时兴于欧洲各国。雷穆萨是这么记述的:

自远古起,针灸便成为中国和日本医学上一种主要疗法,它在欧洲也已实行多年,而在近几个月内受到了法国的普遍赞扬。就像每件新生事物一样,面对这种做法,诋毁者有之,热捧者有之。有的人视之为包治百病的灵验奇术,也有的人说它是毫无意义的手术,担心有时风险很高。双方均有实例为证,由于在欧洲没有机会频繁而又大量地观察到针灸的实际操作,所以亚洲人的经历便被拿来作为依据;至于是否具有科学性也就不屑一破了。

莫朗(M. Morand)、克洛盖(J. Cloquet)、普耶(Pouillet)等著名医生和自然科学家当时多次做过针刺试验。他们在研究针头刺入活体所产生的作用时,受到诱导而认为,病痛是因为电流聚集在了病灶部位,刺入的针尖可能有助于发电。它在这种假说中被看成是插入病人体内的避雷针,他顿时感到疼痛减轻,自然会把这种生理反应与其他物体接触通电的金属导棒所产生的现象相提并论。甚至有人认为,在这种金属针进入皮肤之后,只要触碰十分分钟左右,就会有一种轻微触电的感觉。所以,这时便有人试图解释病变原因(即电流为何集中于分支经络)以及仅仅通过消除电流就能产生的疗效。随后,普耶先生的实验得出结论说,给风湿部位的肌肉扎针确能产生电流,但这种反应并非由于疼痛引起,因为在对非神经痛部位进行扎针时也会出现这种反应。据称,这种形式的反应也会出现在动物身上,而且它总是伴有金属的氧化反应。实验表明,凡是用金、银或者铂制成的针,一概没

有此类反应,这种现象仅仅出现于可以氧化的金属针上。因此,可以推论,人们观察到的物理现象是由金属针与进针部位的化学反应引起的,因为任何金属氧化无不产生电流,可以肯定,这种电流并不具有减轻患者疼痛的效力。

除了有镇痛效果,特别是减轻神经痛和风湿痛,针灸的生理学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如果扎针之前,皮肤已经松弛扩张开来,而且银针是旋捻着扎入,而不是直接猛扎,那患者不会感觉很痛。总的说来,拔针的时候比扎针的时候要痛;针眼附近会渗出血来,但最多不过几滴。银针周围的皮肤微微隆起,颜色不变,但很快平坦下去,形成泛红的晕圈。然后,患者在针灸部位会感觉到针刺,接着出现肌肉收缩,沿着主干神经传递的麻木感,以及发烧似的寒颤。在疼痛部位常可以看到汗滴冒出来,此时,疼痛感已消失,至少已减弱或转移。患者会处于一段时间的昏迷状态,这不是由针灸的疼痛引起的,因为患者这时已不感觉到痛了。看来这便是扎针灸时唯一可能出现的意外。如果针灸扎到主干神经或其他性命攸关的器官,将会导致严重,甚至致命的后果,令人担心。有的大夫宣称,银针那么细巧,足以保证针灸的安全。然而,虽有动物试验显示,银针刺穿胃部、肺部或是心脏,都不会造成严重伤害,但毫无疑问,这些做法也许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中国和日本的大夫都不懂解剖学,对于人体组织结构认识不清,谬见百出,肯定常常会闹出人命来的。但他们扎起针灸来,却有其章法,并不随心所欲。

他们发现人体表面有 367 个穴位,每一个穴位根据它与内脏之关系,都有一个名称。为了避免针灸中的失误,他们做了小铜人像,凡是正确的穴位,上面都挖了小孔,然后用纸把整个铜像糊起来。他们要求学生毫不犹豫地吧银针插入小孔,并在考察其对某一病症的具体操作。

有一次,雷穆萨谈到了日本的一本针灸书,他说:

针灸大夫完全不懂人体各器官的情况与其间的联系,这些防范措施又有何用?他们扎起针灸来,全依一套盲目的操作,要不就凭更可笑的异想天开的生理学理论,这套理论可以追溯到该日本作家收集在此处大大小小的格言与规则。他们的出发点是,动脉血总是从上往下流,而静脉血则从下往上流。因此扎针灸的时候,如果你想使针刺顺着血流的方向,你就把银针朝上扎,反之,就朝下扎。若扎的部位有误,你扎其他相应的穴位,就可以弥补了。这本书里有一半的指导可以说跟这一样有见地。如果有人猛跌一个大跟头,昏厥了,就要用针扎他咽喉上部,即喉对面,扎八英分深。如果是腰痛,就扎腿臀。如果是干咳,就扎手臂外上部,扎一英分深,或者扎前臂中部,或者扎小指根儿。这些部位相隔多远,日本医生大概是靠推测得知的。但我认为,说他们懂诱导法,实在是抬高了他们的本事。在此种或类似的情况下,他们也许仅仅就凭着无知与轻信的经验主义,随机行事罢了。

然而,我不想只根据一本无名氏的小书,就对日本医学作武断的评述。他们有真才实学的大夫——如果日本真有这样的人——不见得会同意这本书里的说法。我们有些医书和外科书也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如果从图书馆里随便挑出几本送到中国作为样本,恐怕会让人质疑我们在医学上的进步。巴黎的国王图书馆里有篇用中文写的针灸短论,里面的讲法则有别于日本人的讲法。这两国的医生对于银针与艾绒的运用,令人称羡。他们似乎有丰富的经验作指导,扎针时穴位的选择并不总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稀里糊涂。借助于经验,他们还知道扎针灸的时候,要避开主动脉血管主要的神经和生死攸关的器官,但有可能他们的这些经验已经使许多患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雷穆萨先生的意见完全一致,尤其是当医生建议给我们的身体扎针时,更加坚定了这种看法。虽然针刺疗法取得了所谓的成功,但是我们并不会心甘情愿地为发展中华帝国的针灸技艺奉献自己的身体。医生当即从我们的手势语言中意识到,我们对扎针表示反感。而且就在这时,丁老爷极其巧妙地提醒道,欧洲人与中国人的身体构造不同,若是扎错地方可就危险了。只听他嚷嚷道:“万万轻率不得呀!这些欧洲人的身体结构我们懂么?他们体内有些

什么,谁能说清?大夫,你怎么晓得你的针刺在什么地方呀?”医生没再坚持扎针,他也承认(或者表面承认),丁老爷说得在理,于是决定仍旧让我们喝那黑乎乎的汤药,当然配方要作某些改动。

当天夜里,情况大有转机。早晨,医生再次来到,对我们说,他准备采取关键的治疗措施,肯定可以如期奏效。服下这种良药,即刻痊愈,不需再服第二剂了。备制这种奇药既不费时,也不麻烦。医生要了半杯茶水,把十几粒红色小丸倒入茶杯,那些球状小丸就跟大头针的针头差不多大。泡入药丸的茶水带有浓烈的麝香味,我们刚刚喝下,在场的人就全被赶出了房间,以便让我们保持绝对安静。虽然我们无法肯定,这种疗法是否有助于减轻或是治愈我们的疾病,但是只过了一會兒,我们就确实感到好受多了,而且这一进展竟然保持了整整一天时间。

到了晚上,我们又服下六颗红色药丸,第二天尽管仍很虚弱,可我们却明显地进入了康复状态。症状业已消失,不再抽搐了,头也不疼了,胃也不痛了,此刻最为得意的莫过于我们的医生!只见他长时间地对在场者吩咐这个吩咐那个,凡是能够想到的话题,他都掏出来说法教一番,而他每句话刚一出口,大家无不争先恐后地点头称善。他尤其念念不忘地重申,这种红色小丸只要用得适当,就会百发百中……

人人都把我们的痊愈归功于这些红色丸药。其实,这种药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它们在中国的名气很大,我们所到之处都有耳闻。它不仅享有盛誉,而且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做“灵宝如意丹”。据说各种疾病,只要服用这种真正的万应灵药,都能无一例外地治愈,难就难在正确地改变剂量,且用合适的水来冲泡。据说,假使服用不当,这种药剂就会引起严重疾病,十分危险。其配方属于秘密,仅仅掌握在北京一户人家手里,他们代代相传,因此,具体成分没法说清。至于它那强烈的麝香味,则算不得特殊之处,因为在中国,这种异常气味不仅可以从药品上闻到,而且可以在其他物件上闻到,地上、空中,还有人的身上,都充满了这种气息。整个中华帝国都能闻到麝香味,就连进口

到欧洲的商品都长期带有这种气味。

虽然这稀世珍宝只是由北京一户人家制造出来的，但它却名扬中华，其售价通常相当公道。然而，要想买到不掺假的就得十分仔细了，这在中国算是一件难办之事。在北京，它的售价从来不变，恰好与纯银同价。一日，我们自己到一家大店买药，我们只需把一小块银锭往天平一侧的盘子上一放，商人则把同样重的丸药往另一侧盘子里一放，就做完了这笔买卖。

这种宝贵药品可能是最有效的发汗剂，只是作用形式较为独特一些。把其中小小一粒碾成粉，放在鼻子前面，当作鼻烟闻一闻，就会连打几个喷嚏，直到全身剧烈出汗为止。有的时候还可采用这种药粉试试病人是否即将死亡。假如让他闻一点点，却不打喷嚏，那他肯定会在一天之内死去；假如他能打一次喷嚏，那他好歹要苟延到第二天才死。喷嚏越多，则生存希望越大。

中药由于做法极怪而受到广泛关注，可供研究的藏书非常之多，但是其中关于配方的记述则少之又少，除了人们有所知晓的东西。当然，欧洲人若是带着科学观点去看，肯定不会找到有趣之处。但是，如果对它们不屑一顾，那就错了。中国人天生具有很强的观察力，他们目光锐利，头脑灵敏，很多虽然细小但却并非微不足道的情況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他们有着古老的文明，而且习惯于记录和保存重大的发现，这样就很容易掌握大量有用的实例。

我们本人从未学过医，但却经常听说，学识渊博、技艺高超的内科医生的观点是，在医治人类疾病时，实际经验和观察能力更比医学理论重要。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身患疾病历来是伴随人类的一大苦恼。上帝让人类自己有能力寻找减轻痛苦的办法，从而保持自身的健康。这样设想，不是很有道理么？我们发现，就连最不文明，甚至是野蛮的民族，也掌握了一定的医疗手段，对此，科学界不仅从未有过类似发明，而且无以解释其疗效。

中国所有的疾病种类至少与别处差不多，但是死亡率并不比外国